钩沉

白桐本究竟是如何来到苏中的

□ 吴剑坤

在如东县，白桐本烈士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关于白桐本的书籍、文章十分多。在这些文字中，对于白桐本如何来到苏中根据地，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从上海穿越日伪封锁线过江而来，一说是先参加八路军，然后转到新四军才到苏中的。持后一种说法的如，中共南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3年编的《江海奔腾　第一辑》载：白桐本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与堂表姐周淑銮结婚,婚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加入共产党。一九四O年秋,他随八路军某部南下,转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从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中，以此为最早。也就是说，可能是始作俑者。1986年，中共如东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如东人民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很可能据此写有：白桐本“一九三八年春，婚后没几天即辞别亲人，参加八路军，不久加入共产党。一九四O年随部南下，参加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一些持第二种说法的文章所写白桐本在参加新四军之前就已经入党，这也与事实严重不符。这第二种说法，甚至误导了一些纪念馆、展览馆对白桐本生平的介绍。笔者认为，为了向公众介绍一个真实的人民英雄白桐本，对于误传有必要加以纠正。

一些当年白桐本的战友的记述和亲人的回忆十分明确地支撑前一种说法，有根有据。

著名作家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著名作家茹志鹃是其妻子）当年是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他在为怀念司徒扬而写的《大江滚滚葬英雄》（载于万中原，张建儿主编的《新四军中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出版）一文中说：

“我在参军之前，与司徒扬素昧平生，1940年10月底，他到上海扩军。”

“1940年初，我从海外回到上海，本想先投考中法戏剧学校，然后作为一个诞生在南洋的华侨青年，到内地看看祖国神圣抗战的壮烈情景，并参加一点工作。抵达上海后，该校已经停办。吴天同志劝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我住在复兴中路(当时叫辣菲特路)一幢洋房的亭子间。那是初冬时节，吴天对我说：‘这几天里有位内地同志来沪扩军，他会来安排带你走，你在家里等着。’”（笔者注：吴天，现代戏剧作家，导演。1927年在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去马来亚做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工作，1938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后因受到英国殖民当局通辑，回国在上海转入中国共产党，做党的地下工作，并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王啸平在马来亚就已认识吴天。）

1940年10月中旬，“我们同行的共5人，除了带路人司徒扬外，新兵还有:闻名的画家、诗人、戏剧家许幸之，两位女同志:黄杰和姚纫磊，前者去向不明，后者现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另一位是后来在反‘清乡’斗争中，威名传遍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闻风丧胆、人民无限爱戴，壮烈牺牲的英雄区长白桐本。”

“轮船在长江航行一夜，清晨抵达天生港，步行几十里便到新四军地区。”在穿越日伪封锁线的此行中，司徒扬将一本抗战剧集藏在热水瓶的瓶壳和瓶胆之间，躲过了日伪的检查。

“司徒扬一路上为我们雇用独轮车，安排住宿。”“我刚到服务团时，住在海安”。

从王啸平的文章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白桐本根本没有参加过八路军。

白桐本的战友李明在《抗日英烈白桐本》一文中有有如下的记述：

那是1940年的冬天。当时，我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前身为皖南军部服务团)驻扎在苏北盐城，常有各地青年前来参军。一天，我见到有个大男孩和俩姑娘，走进服务团团部。我注意到那个大男孩，模样很斯文，一脸学生模样，却穿一件旧棉袍，脚蹬圆口布鞋，看上去又邋遢又滑稽。我从登记表上知道，他叫白桐本，听我们团长说，他的父亲还是个天津富商，他从天津走了几百里路前来投奔新四军。

“富商的儿子怎么穿这么一件邋里邋遢的旧棉袍?”我好奇地问。

“不这么打扮，怎么通过封锁线?”团长说。

“那干吗要冒这份危险到这儿来吃这份儿苦?”

团长反问我：“那么你呢，你这个大小姐为什么来参军?还不是为了不愿当亡国奴!”

……

我又（向白桐本——笔者注）提出了这个问题：“你家这么有钱，吃不完用不完，为何不在家继承父业，跑到这儿来受苦?”

毕竟相处了这么些日子，彼此熟稔，他对我也不藏着掖着。原来他的父亲虽然有钱，但是专横而且封建，非得强逼他与一位富商女儿结婚，他是为了抗婚才从家里逃出来的。经地下党介绍，他原本准备去延安，但是半路被日伪堵截，才南下转投了新四军。

此文见载于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编的《向父辈致敬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一书。此文与王啸平的记述可以互为印证。

1941年，时任如皋县丰西区委书记的顾斌在《人民英雄白桐本》一文中写道：

“白桐本同志,河南巩县人,1940年11月由江南来到苏中海安,后参加新四军1师战地服务团。”

“1941年8月，……如东县委决定白桐本参加丰西区委，当时我任丰西区委书记。……县委于1942年调白桐本同志担任如皋县警卫团2连指导员，后又调马南区队任教导员。”

顾斌的文章载于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老兵话当年　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白桐本在服务团的战友孙海云（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之父）的《你活在人民的心中》（载于江苏省文联、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编《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一文写道：

“1940年10月中旬，在那黄桥决战胜利以后的喜庆日子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到海安，住在韩国钧老先生的家里。11月4日晚，大家神采飞扬，集合在韩老的客厅里，热烈欢迎刚从上海来的知名人士许幸之先生和4位新同志：马来亚爱国的青年华侨，天津进步的青年学生姚纫磊、黄杰、白桐本。年方20岁的白桐本，就从这一天起，成为一名光荣的服务团团员、新四军军人，开始了他的新的革命生涯。”

“白桐本到了服务团，身心获得了解放……。他被分配在剧团工作，却不善于演剧……但是服务团需要他。分工给他的舞台工作也是不可少的。大家对他的印象：一是埋头苦干，二是刻苦学习。……他的模范行为，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赖，很快当了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负责剧团的日常生活管理。”

“由于白桐本在各方面表现较好，……先后加入了青年队和共产党。”

“1941年8月，为了应付日伪军的空前大扫荡，领导上决定服务团全体人员暂时分散到如皋和东台县境，做群众工作。”

上述白桐本的几位战友的回忆都说明，白桐本是从上海渡江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根本没有参加八路军。从下面白桐本的两位亲人的追述中，也能相互印证。

2014年“中原网”的记者采访白桐本的堂弟白朴本老人后报道说：

在河南省巩义市城中心，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柏油大道，名为桐本路，这是为了纪念在苏中平原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勇士白桐本而命名的。白桐本出生在河南巩县，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奔赴苏北抗日战场，英勇善战威震敌胆，颇具传奇色彩，在苏、豫两地都留下了传世美名。他牺牲时，《解放日报》以“人民领袖白桐本”为题发表纪念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褒奖。

时值白桐本壮烈牺牲70周年，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深秋，中原网记者驱车来到巩义，拜访了白桐本的堂弟白朴本老先生。白朴本的家就在桐本路上，老人每天走在这条以亲人之名命名的大路上，百感交集。

白桐本，字梧村，1920年5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原巩县窟头村古桥庄（今巩义市河洛镇古桥村）。

堂哥少年时期就博览群书，尤其重视阅读进步书报，他还通过地下党找来《共产党宣言》学习。在北平志成中学上学时，白桐本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始只是在街上发传单，后来还在街头巷尾举行演讲，把闲散人员聚集起来办讲座、办“夜校”。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白桐本成了其中的活跃分子和骨干人物。15岁的白桐本在游行队伍里跑前跑后地指挥，手持写着抗日口号的彩旗，一边散发一边高呼口号。“队伍里就数他最积极，家里人都说这孩子将来要‘出大事’”。

白桐本18岁时，就读的天津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被日伪当局残忍杀害。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他决心奔赴抗日前线，拿起武器去消灭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

“他从天津乘轮船，经上海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经组织介绍在海安地区参加了新四军，成了新四军一师政治部服务团团员，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白桐本的表弟王宇在1999年8月写的《白桐本青年时代片断》一文中说：

白桐本是我表兄弟，他长我3岁。我们青少年时期一起在北平读书。

……

1935年，白桐本在志成中学初中部读书。他性格刚毅、慷慨厚重，爱国热情极高。“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深恶痛绝，学校以及北平市群众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爱国抗日活动，他都是积极参加的。当时，他还非常重视体育和武术，立志锻炼好身体报效祖国。

……

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前后，白桐本经常早出晚归。游行的当天，队伍路过家门口时，他送了几张宣传品就走了。

……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在日寇未进北平城之前，我们一家随舅父急速前往天津英国租界避居。暑假后白桐本进了耀华中学高中部。耀华中学是一所著名学校，校长是个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人士。在社会上很有威望。不幸……被日本特务刺杀于寓所附近，引起天津各界极大震惊。这件事对白桐本的影响很大，更增加了对日寇仇恨。此后他参加的一系列活动都证明他已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战士。

……

我因和他住在一间房内，常听他讲一些抗战英雄故事，或者介绍一些图书给我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

白桐本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前，对我说他要走了，祖父不同意，只好不辞而别，要我在他走后，向他祖父要钱，将旅费还给人家。……大约一两个月后，他从苏北寄来一张明信片，我给外祖父看了，一家人都默默无言，好像心里都和我想的一样：投奔共产党去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该文见载于政协巩义市文史委员会2000年编印的《 巩义市文史资料》第22辑。

王宇，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于1945年参加八路军，长期任《解放军报》编辑。

从上面这一些材料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知道，白桐本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从天津南下到上海后，通过新四军地下交通线秘密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事先并没有参加八路军；而且可以知道，白桐本参加新四军前，就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

回忆

水车的故事

□ 田汉臣

儿时，我吃饭常常掉米粒，妈妈说我下巴有个“洞”，而爷爷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伢儿啊，米粒要珍惜，它来之不易呀，一粒米七斤四两水呢。”当时因年幼，不知其意，但我一直铭刻在心……

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那会儿，生产队劳力紧张，我家伢儿多劳力少，生产队安排了朱长庆老伯带领我们3个“一抹头”毛头小伙儿（16岁、15岁，12岁），包了一个小车口，负责3亩多地脚踏水车的车水任务。小时候几个小朋友出于好奇也玩过水车，但真正作为一个劳动力来使用还是第一次。早晨三四点起床，车到8点多钟方才结束，早晨凉爽还可以，待太阳上来了，就像进了蒸笼一样，满脸汗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流淌，眼睛都难睁开。虽然是打赤膊，但下半身的短裤都要湿了一半。心里想：“谁能发明一种神器，把水从河里自动抽上来，那该多好啊。”这种天真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实属画饼充饥、天方夜谭。

呼噜噜、呼噜噜、脚踏水车真辛苦，真辛苦、手扶木杆、走着悬空路；走一步、又一步、滔滔流水往田里吐，往田里吐、一点一滴、都是血汗流；脚又痛、腿又酸、浑身骨节都发酥……这首掘港、童店流行的《踏水谣》真实反映了当时车水的艰辛。当我车水车得筋疲力尽时，才真正尝到了劳动人民的滋味。这滋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但真正品尝到的是爷爷那组“七斤四两”的数字，切身感受到了米的来之不易，真正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意！

脚踏水车：是当时农民种植水稻的农具中一种使用最为普遍的提水工具，它由车槽、斗板、榷儿用健子连接成链条，放在车槽内，用一根木头称水幢竖在河中，用掠车索托住车槽再用绞关固定好，岸上大车轴凳在两边的眼沟上，用两根木头旱幢夹住，这就算把水车支好。水车安装完毕后，用1根伏桁架在两边的旱幢上。4人上车，手扶在伏桁上脚踏车水榔头，用力向下蹬，通过轴上的轴齿带动水中的小水轴，整个链条循环转动，通过斗板把河沟里的水源源不断地提了上来，进入水沟流入稻田。特别是水需求量到达峰值，即“抢水”季节，仅剩沟底水时，稍有疏忽，水就会从那里来又回到那里去，只有4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力量，再配以气势恢宏、雄壮有力、余音绕梁的“车水号子”方能把水车上来：“哎嗨哎嗨号、哎嗨哎嗨号，哎嗨嗨嗨，嗨，哎呀号，哎嗨嗨的个号来，哎嗨嗨的个号来，哎嗨嗨的个号来，哎嗨嗨的个号来。”车水既是个体力活儿，也是个技术活儿，用蛮力不用巧力（技巧），就会“踏榔头绷儿”。当时农民没有闹钟，更没有手表，为了掌握稻田的需水量及车水时间，在榷儿上用稻草把做一个记号，用带子串成50个左右的方孔小钱，转1圈丢1个，车50圈为1个头子，一般要车3～5个头子，下车休息少许，擦擦汗水，喝点水，然后再继续……

朱大伯那时才50岁上下，有轻微气喘，种田是一等一的行家里手，且身怀木工绝技，是“荒年饿不死的手艺人”。他为人忠诚老实、与人为善。每次车水，他要从田西头跑到田东头来叫我，然后再折返去车口，所以他必须提前10多分钟。早晨的这个黄金时间何等宝贵啊！回想起来，我很内疚。如当时有闹钟，就不需要他老人家操心。车水时，我年龄最小，他很照顾我，教会我们车水要令，看到我们车得实在吃不消时，就示意提前休息一下。平时水车调试，全是他一人负责。这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传承和颂扬。遗憾的是，朱老伯因积劳成疾早已仙逝，未曾看到现代化的抽水机、电灌站。

牛车篷：我们生产队还有牛车篷，车篷外面看像一顶大斗篷，篷内有一根大立柱，立柱是一个大底盘，俗称八卦的中轴，在底盘上装有齿轮，由牛牵引底盘转动带动水车轴，把水从河里提上来。牛在大忙时要耕地耙田，就组织人力推水。我当时学校放假时，也顶一个劳力加入推水队伍，推水时反复打转，转得头晕眼花，8人必须通力合作，毕竟是力气活儿，好累啊！

风车：我们生产队20世纪60年代有1台风车，它是借助风力的提水工具。儿时常去观看，甚是神奇。它是由一个大大的圆架做底盘，底盘上竖8个桅杆，每杆上挂一合帆蓬，组成8合帆蓬的风车。风吹帆布，大盘转动，带动拨齿，而让龙骨车转动，把水提上来。所谓风车，有风才能转动，没风只能望车兴叹。搞了两三年，其中1年等风风没有，等天天无雨，结果水稻断水后成片稻田成龟背裂纹状，结果那年水稻大减产。

50年代中期，那时未能实现引江入如，取水仅靠遥望港，一时间上演了一场（南）通、如（东）两县抢水“大战”。当时水位低，为了多得水，1956年乡领导组织劳力用水车从遥望港里拨水到内河。水稻水稻，有水才能长稻，因为水太紧张了，大部分水稻缺水严重，水稻减产歉收，那时产量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老百姓苦不堪言，留下种、交足公粮，所剩无几。

到了1958年，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大力号召下开挖了九圩港、如泰运河，修建洋口闸、刘埠闸、东安闸。1959年又开挖掘遥河、掘苴河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抗日战争中领导南通人民取得抗日反“清乡”全面胜利的苏中四分区司令员、后任东海舰队司令的陶勇为如东水利工程题词祝贺。其中有郭沫若“如泰运河九圩港，纵横凿贯如东乡，输引长江入黄海，还看舳橹似桅樯”等的诗赞文颂。还有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来了共产党，开了九圩港；有了九圩港，闻到稻米香”脍炙人口的民谣。

记得到了1963年，开始用船机，把柴油机、水泵装在船上，巡回到各生产队田块灌水，船机到了后，要社员给水泵灌水、接水才能把水抽上来。但比起车水要轻松得多。一个大队1台船机在各生产队之间来回走动，但由于巡回周期较长，还存在水稻缺水现象。

到了1965年，大队购回了一台大功力柴油机配以大水泵，修筑灌溉渠道，设总渠、分渠、支渠，使每个田块都能均衡正常灌水。虽水稻能增产，但柴油成本高。

为了进一步减本增效，1974年向上级申请用电。通电后发动社员挖闸塘建电站，重新更新水渠。后来为了节约耕地，由明渠改建为暗渠，由漏水渠修建成防渗渠，大大节约了农本，深受广大社员欢迎。

水车、牛篷车、风车、船机、机灌、电灌，从千年的人、牛工水车，演变到现在的电钮一揿水就流入农田。而在哗哗的江水、河水流入万顷良田时，也流入到老百姓的心田。这就是我小时候所渴望的“神器”，如今梦想成真！